

題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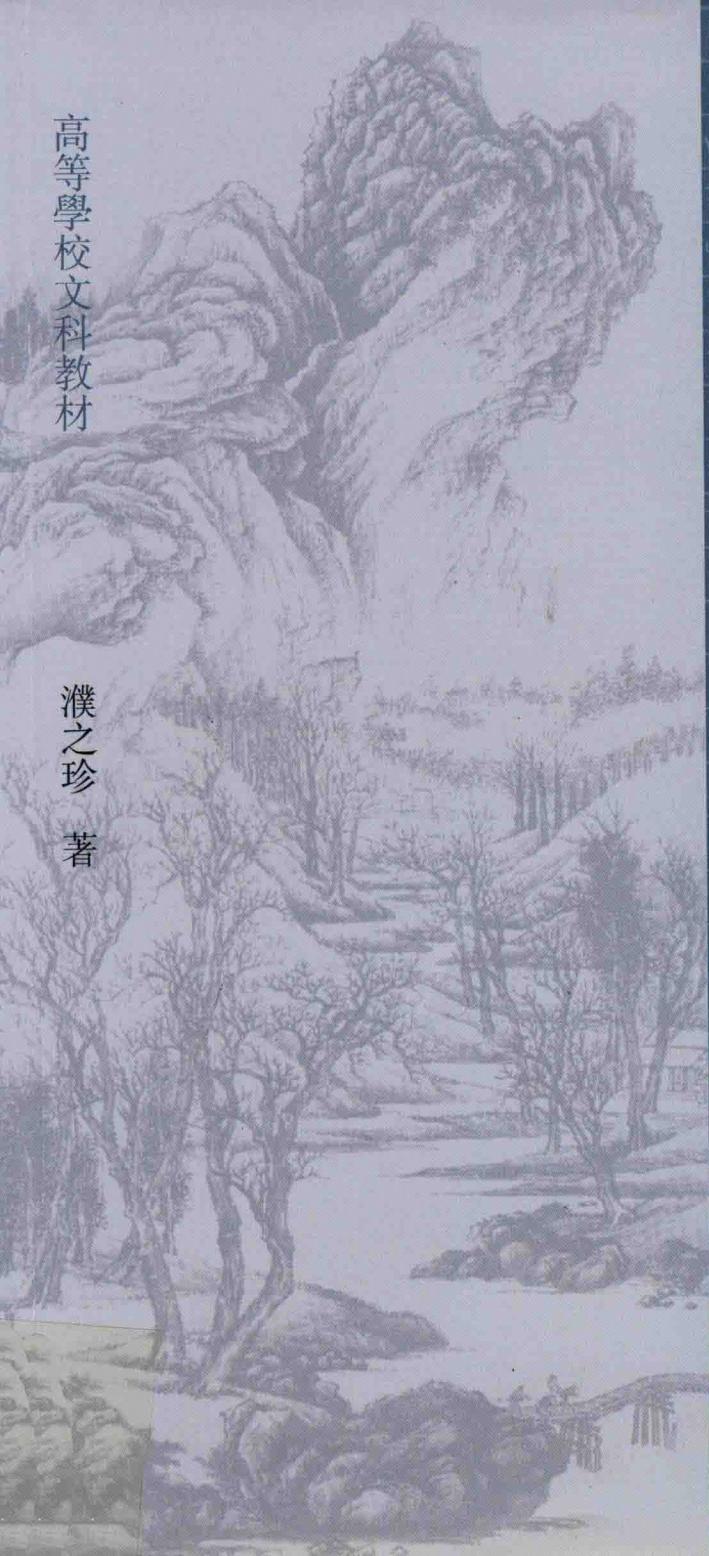
中國語言學史



文
言
方
言
文
雅
可
能
是
方
言
的
西
秦
從
方
言
成
書

高等學校文科教材

濮之珍 著



高等學校文科教材

濮之珍 著

中
國
語
言
學
史

可能
是
方
言
的
四
全
從
收
集
方
言
成
書
方
言
觀
察
二
題
皇
朝
相
傳
文
字
學
於
方言
考
古
學
方
言
學
史
中
國
語
言
學
史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語言學史 / 潘之珍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6

(高等學校文科教材)

ISBN 978-7-5325-8358-4

I. ①中… II. ①潘… III. ①漢語史—高等學校—教材
IV. ①H1-0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038583 號

高等學校文科教材

中國語言學史

潘之珍 著

出版發行：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l@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www.ewen.co

印 刷：上海惠敦印務有限公司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印刷廠聯繫調換)

開 本：890mm×1240mm 1/32

印 張：16.5 插頁 4

字 數：442 千字

版 次：1987 年 10 月 1 版 1 次

書 號：2017 年 6 月第 2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數：ISBN 978-7-5325-8358-4/H · 172

定 價：1—3,100

定 價：58.00 元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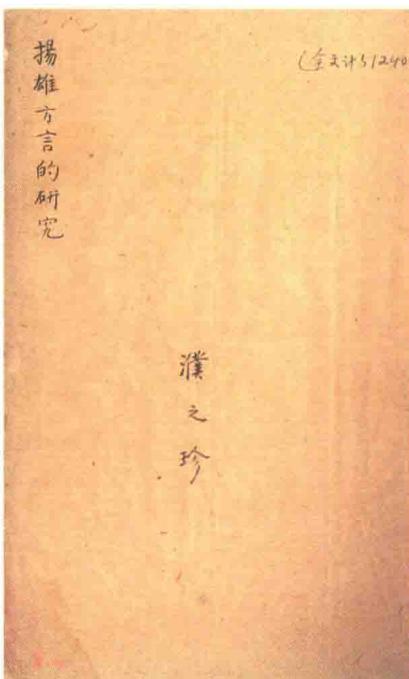


濮之珍，女，1922年12月22日生於安徽蕪湖。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1945年畢業於國立女子師範學院（四川白沙）中文系。1948年考取前中央大學（後改為南京大學）中文系研究生。研究生畢業後，於1951年應聘至復旦大學中文系任教。1987年榮獲上海市巾幘獎。1992年榮獲國務院高等教育突出貢獻獎，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曾任上海市語文學會會長，上海市社會科學聯合會常務理事，上海市政協副秘書長、常委，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中國農工民主黨上海市委副主委。代表專著有《語言》（上海新知識出版社，1956年初版）、《中國語言學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初版）、《濮之珍語言學論文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初版），主編有《中國歷代語言學家評傳》（復旦大學出版社，1992年初版）、《社會科學爭鳴大系（語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初版）等。2016年9月，以其在語言學研究領域取得的卓著成就，榮獲“第一屆上海市語言學研究終身成就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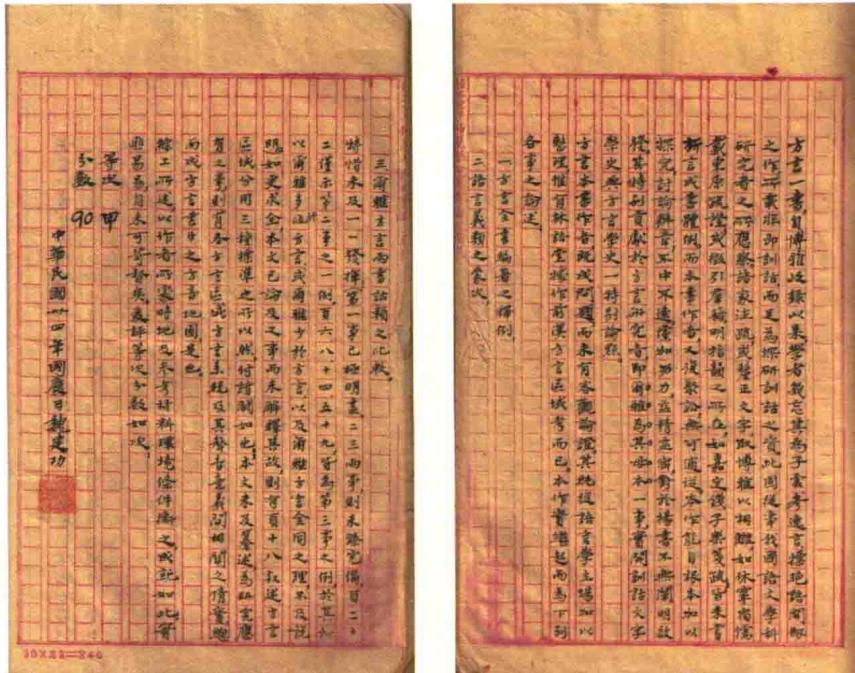


揚雄方言的研究

(全文计 51240)



作者《揚雄〈方言〉的研究》手稿



魏建功先生評《揚雄〈方言〉的研究》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1
一、中國語言學史研究的對象和任務	1
二、正確對待語言學史中的繼承問題	7
三、研究語言學史要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指導	10
第二章 先秦時期的語言研究	13
一、概述	13
二、先秦諸子關於語言、文字問題的討論	29
三、荀子的語言學思想	35
荀子·正名(節錄)	40
第三章 秦漢魏晉時期的語言研究	43
一、概述	43
二、我國古代第一部語言學專著《爾雅》	54
爾雅注序	郭 璞 67
三、揚雄的語言觀及其《方言》一書的成就	69
方言注序	郭 璞 94

2 中國語言學史

揚雄答劉歆書	95
劉歆與揚雄書	98
四、許慎的語言觀及其《說文解字》一書的成就	100
說文解字序	119
許慎	
五、探求漢語語源的專著《釋名》	125
六、漢末魏晉時期的語言研究	134
第四章 南北朝至明代的語言研究	149
一、概述	149
二、南北朝至隋唐時期的韻書	170
切韻序	199
陸法言	
顏氏家訓·音辭篇	204
顏之推	
三、宋代的韻書	211
四、元明時代的北音韻書	251
五、宋元時代的等韻學	271
六、宋明時期的古音研究	298
第五章 清代的語言研究	307
一、概述	307
二、顧炎武的古音學研究	308
音學五書序	317
顧炎武	
三、古音學研究的全盛時期	319
六書音均表序	338
戴震	
四、古代語言學的繼承和發展	354
廣雅疏證序	394
段玉裁	

目 錄 3

五、語法研究的興起	396
第六章 “五四”運動後的中國現代語言學	411
一、“五四”運動和中國現代語言學的產生	411
二、語文改革新領域的開拓	420
附錄 揚雄《方言》的研究	427
主要參考書目	511
後記	517
再版後記	521

第一章 緒論

一、中國語言學史研究的對象和任務

中國語言學史研究的對象是中國語言學發展的歷史，即研究各個歷史時期的語言學家、語言學著作和各個歷史時期的語言學。我國研究漢語的歷史很悠久，研究的成果也很豐富，這是祖國文化遺產中一個重要的方面。

國內外學者，對語言學史進行研究，取得不少成績。在我國，早期有胡樸安的《中國文字學史》和《中國訓詁學史》、張世祿的《中國音韻學史》等。這些著作受了傳統“小學”的影響，把我國語言學史，分成文字學史、音韻學史、訓詁學史三個方面來寫，自有其方便之處，對中國語言學史的研究也有貢獻。

解放後，1958年科學出版社出版了岑麒祥的《語言學史概要》。《中國語文》雜誌從1963年第3期至1964年第2期，連載了王力的《中國語言學史》（現已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另外，《中國語文》雜誌從1956年開始，先後發表了多篇“中國語言學史話”的文章。國內各種社會科學雜誌、文科學報上，也陸續發表了一些有關我國語言學家、語言學著作評介的文章。以上這些研究成果，對中國語言學史的進一步討論、研究，都

是很有價值的。

國外研究語言學史的著作，已翻譯的有：丹麥語言學家湯姆遜（V. Tomsen, 1842—1927年）的《十九世紀末以前的語言學史》（黃振華譯，科學出版社，1960年版）和丹麥語言學家裴特生（H. Pedersen）的《十九世紀歐洲語言學史》（錢晉華譯，科學出版社，1958年版）。又1977年《語言學動態》第2期上，刊登了趙世開譯述的《羅賓斯：語言學簡史》（現已出版）。這些外國語言學史的研究成果，對中國語言學史的研究也有啟發和參考的作用。

語言學既是一門古老的學科，也是一門世界性的學科。我國語言學歷史悠久，歷代語言學家衆多，語言學著作非常豐富，我們語言學面對祖國這份語言學遺產，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分析研究，繼承發揚，又如何把我國語言學史中傑出的語言學家和他們的科學研究的成果向世界語言學界介紹，這其中有許多工作需要我們認真研究，并努力去做的。

在西方語言學家的語言學史著作中，是只有西方的語言學史，而沒有中國語言學史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漢字難學難認，文字的障礙很大，使得外國語言學家很少也很難研究中國的語言學史；另一方面，我國語言學家研究語言學史的也很少，向國外介紹中國語言學史的研究成果的就更少了。因此，長期以來，歐洲語言學界有一個相當普遍的看法，即認為語言科學建立于歐洲十九世紀初。因為十九世紀初，在歐洲產生了歷史比較語言學，由此又產生了普通語言學，對語言科學起了很大的作用。於是西方語言學界就認為，在這以前的語言研究，特別是東方民族的語言研究，是所謂“科學前”的語言學，或“語文學”。這種看法，也影響了我國語言學界。

我國歷來對語言學的重視是不夠的。例如，歷代史書中的儒林傳，就很少有語言學家的傳記。《漢書》中有《揚雄傳》，《後漢書》中有《許慎傳》，那是因為揚雄是辭賦家，許慎是經學家的緣故。由於不夠重視語言

學，從事語言學研究的人又少，直到現在還有一些問題得不到澄清。其中有一個大問題，就是我國古代到底有沒有語言學？岑麒祥先生在《語言學史概要》一書中認為，只有十九世紀以後的語言研究才是科學的；王力先生在《中國語言學史》的“前言”中說：“中國在‘五四’以前所作的語言研究，大致是屬於語文學的範圍。”又說：“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的語言學，基本上就是語文學；……語文學在中國語言研究中佔統治地位共歷二千年。”當然，這還是他們二位過去的一些看法。在六十年代《中國語文》上也曾發表過不同意見的討論文章。可是後來又沒有繼續再討論下去。那麼，中國古代的語言研究，到底是語言學？還是語文學呢？總不是那麼明確。“語言學”和“語文學”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這是帶有褒貶性的兩個概念，“語文學(Philology)和語言學(Linguistics)是有區別的。前者是文字或書面語言的研究，特別着重在文獻資料的考證和故訓的尋求，這種研究比較零碎缺乏系統性；後者的研究對象則是語言的本身，研究的結果可以得出科學的、系統的、細緻的、全面的語言理論”。^①由於語言學、語文學之分，是對祖國幾千年來的語言研究工作和研究成果的總看法、總估價，所以，這個問題很重要，是應該再討論再認識的。

認為中國古代只有語文學而沒有語言學，主要有以下三點理由：一是中國古代語言學研究的對象是文字，不是語言；二是中國古代語言學是為解經服務的；三是這種語言研究的成果比較零碎，缺乏系統性。但這幾點理由，似是而非，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首先，在文字產生以前，那時只有口語；文字產生以後，就有了書面語。這樣，語言便以口語和書面語兩種存在形式而為人民、社會服務。我國古代語言學研究的對象主要是文字，也就是研究書面語，怎麼能因此認為沒有研究語言本身呢？況且書面語比口語更加規範。在古代，由於科學條件限制，口語一發即逝，以書面語——文字為研究對象，又有什麼不

^① 見王力《中國語言學史·前言》。

對呢？就是在科學發達的今天，我們即使可以借助錄音機之類的儀器來研究語言，但儀器的作用也只在於記錄口語，從某種角度說，它的作用和文字是相似的。可見提出“文字和書面語”來和“語言本身”對立，是不妥當的，因為兩者實際上是分不開的，不應該對立的。對有文字的語言進行研究，是不可能拋開文字和書面語的；而對於沒有文字的語言，我們也要想方設法把語言記錄下來才能進行研究。可見，我們不能因為中國古代語言學研究對象是文字和書面語，就把中國古代語言學排斥在語言科學之外。何況外國古代語言學，也是以文字和書面語作為研究對象的。

另外，從我國古代語言學研究的事實來看，也難以用這個標準來劃分我國古代語言研究是語文學，或是語言學的。王力先生一面說：“語文學”統治了中國語言學兩千年。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承認：揚雄的《方言》“是漢語方言學的第一部著作”，聲訓“已經超出語文學範圍，而進入了語言學的範圍”，《切韻》“實際上已經超過了這種（適應詩賦）需要的範圍，而進入了語言學的領域”，等等。可見，不能認為我國古代沒有語言學。

其次，認為我國古代語言學是為解經服務，是經學的附庸，因此只能是語文學，而不是語言學。我國古代語言學研究的興起，是為解經服務，這是事實。但是，任何一門學科的興起，總是有它的目的，語言學也不例外。這種情況不僅在中國古代是這樣，在外國古代也是這樣。外國的語言研究，最初興起也是為閱讀古典文獻服務的。羅賓斯在《語言學簡史》一書中也講到這一點，在第三章介紹羅馬語言學時，他說：本期特點：即為古典文獻注釋不注重口語。在第四章中說到中世紀西方語言學，他說：本期為教拉丁語和翻譯聖經做了工作，重要發展為“純理語法”（Speculative Grammar），句法研究有創造。

各國的語言不同，各國的社會發展具體情況也有所不同，因而語言學的興起發展的道路也就不同。我國古代先秦時期，語言異聲、文字異形。秦漢統一以後，做了“書同文”的工作，因而古代語言學的發展首先是字書的興起。由於漢字是表意文字，漢代有今文經和古文經的問題，因此，在

學習古典文獻、講解儒家經典方面有許多問題，於是訓詁學和文字學就最早發展起來。古代印度和希臘的語言學的興起，首先在語法研究方面，這是因為他們的語言結構和漢語不同，而為閱讀古典文獻服務，這種最初的研究目的却是一致的。我國古代語言學的研究，開始是為解經服務，是為了解語言的實際問題，這種聯繫實際的研究，應該說是對的。

對語言研究為解經服務，為什麼會產生不好的看法呢？這是因為受了西方語言學家的某些看法的影響。如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就提出了“為語言研究而語言研究”的口號，有些人接受了他的看法。其實，任何學科都不可能“為研究而研究”的，它總是為一定的目的服務的。當然，索緒爾提出“為語言研究而語言研究”的看法，在當時，對語言科學的獨立研究有積極意義；不過，把這個看法絕對化，又反倒給語言研究帶來不好的影響，即導致多年來語言研究的脫離實際。

第三，說中國古代語言研究比較零碎，缺乏系統性，因而只能是語文學，稱不上語言學。這種看法也是不符合中國古代語言研究實際的。

我國語言研究有悠久的歷史，與世界上其他語言研究相比，毫不遜色。例如，先秦時期，荀子對語言的社會本質的闡述，就是很科學的。到了漢代，我國就已經出現了傑出的語言學家揚雄、許慎及其語言學著作《方言》、《說文解字》等。揚雄的《方言》就是以活語言為對象，運用調查研究的方法來收集各地方言，并結合時地進行研究，反映出漢代共同語和方言的基本情況。在公元初，揚雄就能寫出這樣的語言學著作，是了不起的。在世界語言學史上，揚雄《方言》是第一個提出“通語”和“方言”的概念，并能指出通語和方言之間複雜的發展變化關係。而歐洲是直到十八世紀末才有方言詞典的。在中國古代語言學史上，從《爾雅》、《方言》到《說文解字》是一個大發展。《爾雅》只講字義，而《說文解字》除字義以外還講字形和字音。《爾雅》只是材料的收集和排比，而《說文解字》則對漢字進行科學研究，研究出漢字的結構規律，構成了一個科學體系，成為我國古代第一部字典。這部書即使放到世界語言學史上去看，也是一部輝

煌的語言學著作。

由於漢字是表意文字，漢字本身不表音，使我國古代語言學研究方面，受到一定局限。但是，即以語音研究而言，在世界語言學史上，我國古代語音研究也是比較早的，而且是有成績的。從漢末、魏晉南北朝時期起，由於佛教的傳入，梵文的影響，我國興起了語音的研究。我國古代語言學家接受了外來影響，聯繫了漢語的實際，創造性地分析出漢語的聲母、韻母和聲調系統，又研究出《切韻》音系、“三十六字母”、“等韻”和《中原音韻》等語音方面的優秀成果。又如清代語言學家顧炎武、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和江有誥等，他們的研究方法比較科學，成績也是十分傑出的。他們對漢代語言學進行整理發揚，又使清代語言學開拓了新領域，他們在先秦古音研究方面有驚人的成績。如果說中國古代“小學”是“經學附庸”的話，到了清代已經是“蔚為大國”了。

總之，我國語言學有悠久的歷史，輝煌的成績。只是由於社會發展不同，語言特點不同，我國古代語言學史有自己發展的道路。我國古代語言學家是以漢語、漢字作為研究對象，以研究出漢語、漢字的一些客觀規律作為研究任務。科學的任務就在於揭示客觀事物的本質，發現並認識客觀事物本身的發展規律。面對祖國這份豐富的語言學遺產，我們有什麼理由說我國古代沒有“語言學”而只有“語文學”呢！

中國語言學史研究的對象和任務，就是要研究中國語言學的歷史發展，研究各個歷史時期的語言學家、語言學著作和各個歷史時期的語言學。我國語言學的歷史發展不是孤立的。我們要聯繫社會發展的歷史，以及使用漢語的人民的歷史來進行研究。各個時期的政治狀況、哲學思想、社會思潮和文學的發展，對語言學的發展也是有一定影響的。例如，先秦諸子的“名實之爭”就關係到對語言社會本質的認識；魏晉南北朝時期，我國古代語言學興起了語音研究，這是和當時佛教傳入，梵文影響，以及當時文學上講究聲律有關係的。“五四”運動對我國現代語言學的形成和發展、影響也是較大的。我們研究語言學的歷史發展，要注意這些

方面。

當然，要想寫出一部比較系統的、科學的中國語言學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過，這樣的著作是非常需要的。王力先生已經第一個作出貢獻，為我們開路奠基。我們要繼續努力對中國語言學史進行研究，繼續發揚中國古代語言學的優良傳統，建立起具有中國自己民族特色和氣派的語言學科學體系。這就必須科學地揭示中國自古以來語言學歷史發展規律，從而做到古為今用，否則還是“言必稱希臘”，單是引證西方語言學如何如何，那還是不行的。因此，我們要努力去打開中國古代語言學的寶庫。

二、正確對待語言學史中的繼承問題

人類文化之所以能不斷發展，其中重要的一點是善于繼承。歷史上優秀的學者之所以能取得很大的成就，除了他們的創造精神外，重要的一點是他們能正確并善于繼承前人的優秀的文化遺產。例如，許慎創造性地寫出了《說文解字》這部了不起的語言學著作，那是因為在他之前已經有許多字書，如李斯《倉頡篇》、趙高《爰歷篇》、胡毋敬《博學篇》，以及揚雄《訓纂篇》、史游《急就篇》等字書。這些字書先後共收錄了五千多字。另外，還有《方言》、《爾雅》等語言學著作。許慎就是在前人基礎上，將漢字增收到九千三百五十三個。他不僅在數量方面比前人多收了漢字，并能進一步解釋漢字的形、音、義，總結出漢字的一些結構規律，從而使《說文解字》成為我國語言學史上極有價值的一部著作。許慎在《說文解字序》中也說自己“博采通人”。可見，繼承前人的優秀文化遺產是十分重要的。揚雄在《答劉歆書》中也說他寫《方言》一書，參考了嚴君平收錄的一千多字和林閭翁孺收集的方言。陸法言作《切韻》也是繼承了六朝時代各家韻書，在集體討論時，又多尊重顏之推、蕭該的主張編集而成。陸法言在《切韻序》中明白指出：“取諸家音韻，古今字書。”又說：“蕭、顏多所

決定。”由以上可知，在一門學科發展中，正確對待文化遺產，善于繼承文化遺產是十分重要的。

在繼承問題上，有兩種不同的態度：一是有繼承，有發展；另一種是只繼承、不發展，或不敢有所發展。後一種態度是不利于學科的發展的。例如《說文解字》和《切韻》這兩部書在中國語言學史上，可以說是兩部權威性著作。後世有的語言學，就墨守這兩部書，不敢有所觸動。比如許慎寫《說文解字》的時代是漢代，字體是以小篆為標準。漢字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變化，已經由篆書變成隸書，變成楷書、行書了。但是，過去有的人寫字還要以《說文》的小篆為標準，甚至對後世出土的甲骨文，也不予承認。又如《切韻》一書記載的是中古音系，漢語語音隨着社會發展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已變化得和《切韻》所代表的中古音系不一樣了。但是，過去也有人墨守《切韻》系韻書而不敢突破。而周德清的可貴之處，就在於他不但能繼承歷代韻書中合理部分，而且敢于按照當時的語言實際，寫出和《切韻》系韻書不同的新韻書《中原音韻》來，在漢語言學史上，作出了傑出貢獻。周德清的這種既能善于繼承前人文化遺產，又能聯繫語言實際並有所發展的科學態度，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繼承貴在創造，這在我國語言學史上，也是有傳統的。王國維在《觀堂集林》中，就很推崇晉代郭璞的《爾雅注》和《方言注》二書。郭璞精通音義和訓詁，他不僅給古書作注釋，而且有創造發展。他在《爾雅注》中不僅用今語來注古語，而且運用了揚雄《方言》和晉代活的方言材料。在《方言注》中，他能聯繫當時晉代方言與之比較，并指出漢代語言發展到了晉代，哪些仍舊保留着，哪些已經有了發展變化；又有哪些漢代方言，到了晉代已發展變化成為通語了。這樣，可以看到漢語從漢代到晉代的發展變化，為後世的語言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例如：

《爾雅·釋鳥》：鳴鳩、鵠鵠。注曰：今之布穀也。江東呼爲